

“霸权稳定论”与中国 新安全观：一种比较视角

孙 晓 玲

【内容提要】 “霸权稳定论”与中国新安全观分别作为指导美、中两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核心理论，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了解这两大理论，比较其异同，可以加深我们对复杂国际问题的认识，理解我国处理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关键词】 霸权稳定论；新安全观；伊拉克问题

【作者简介】 孙晓玲，1974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上海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4)02-0052-05

“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契机，将战争从阿富汗扩及伊拉克，国际安全及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立场颇难统一。其中，中美两国的立场比较具有代表性，体现着这场争论的两极。美国在以“霸权稳定论”为核心的“单极稳定论”、“新帝国主义论”、“不得帝国主义论”^①等系列的理论指导下，认为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取决于美国的领导，取决于国际恐怖势力的清除，为此不惜一战。中国以新安全观为理论依据，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的安全并非一国所能赋予，它需要各平等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合作与协商，做出共同的努力。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和平手段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方式。

中美之间，究竟哪一种立场更有利于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的最终解决？哪一种更有利于世界和平？笔者认为，充分了解“霸权稳定论”与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比较其异同，有助于我们做出理性判断。

一 “霸权稳定论”与 新安全观简述

（一）“霸权稳定论”和霸权后合作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冷战”结束后，该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它最初由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在经济领域里提出，认为霸权体系的存在对稳定世界经济至关重要。80年代，该理论被莫德尔斯基、罗伯特·吉尔平等人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其主要观点是：霸权体系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政治格局的稳定。随着当时批判理论的兴起，“霸权稳定论”也受到了挑战。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提出“霸权后合作论”，名为批判“霸权稳定论”，实质上起到了完善该理论的作用。“霸权稳定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如下四点：

^①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Sept. – Oct. 2002, pp. 44–45.

1. 霸权带来稳定说。所谓霸权国,是指军事、政治、经济及自然资源等诸方面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能够强行推行并在一定时期实现其意志的大国。而霸权体系则是指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体系。霸权国的存在与国际体系的稳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正如基欧汉所说:“由一个霸权国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益于强大的国际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比较明确,霸权国既能够也愿意建立和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的规章和条例,自由国际体系因此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①“能够”是指实力,“愿意”即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并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2. 霸权提供公共商品说。为什么国际体系的稳定需要霸权呢?为论证其中的原委,“霸权稳定论”引进了经济学中关于公共商品的概念。在国内社会,公路、人行道、灯塔等这类公共物品对于维护开放经济非常重要。但是由于个人可以免费消费它们,公共商品经常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行为主体愿意为这种产品承担更大的份额或者有某种权威机构迫使消费者为它们付费。对于开放的国际社会而言也是如此,国际社会需要稳定的货币体系、自由的贸易体系、有组织的国际安全体系等,所有这些,在国际社会缺乏公共权威的现实下,只有霸权国才有实力、有意愿去提供,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免费搭车”现象。霸权国为承担公共商品而提供成本,做出了自我牺牲,^②却为世界带来了稳定。

3. 霸权必衰说。根据吉尔平的论述,由于三个层次的原因霸权必衰。一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经济力量的分配格局必然会被新的霸主所打破。二是从受益角度看,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霸权国为维持霸权而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当“霸权国国内消费和保护这种体制而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时”,霸权国在经济上将丧失提供公共商品成本的能力,从而不得不放弃霸主的地位。三是从对“免费搭车”的后果及道德影响上分析,免费搭车者一方面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权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失去为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愿。^③

4. 霸权衰弱并非不可挽救说。吉尔平认为“建立新体系的成本比维持体系的成本要高,这使得旧国际体系的惯性时间会非常长,霸主国的作用不仅仅在于

该体系的日常运作,而且在于控制住危机局面。”^④因此,美国要维持霸权必须未雨绸缪,只要措施得当,霸权的衰弱就会被遏制。为此,霸权国可以采用削减成本、减少国际承诺、多边领导等手段来延缓霸权的衰弱。而“霸权稳定论”的完善者基欧汉则非常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因为相对于建立新的霸权机制,霸权国建立的机制可以通过一些共同的安排,建立起关于国家行为的关键预期,可以改变相对的交易成本,使各国谈判的追加成本更加低廉。国际机制使协商后的合作成为可能,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因此得以稳定。^⑤

(二) 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内容

中国新安全观产生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转换而日臻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客观上为我国突破冷战坚冰、打开国际合作的通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将我国的安全观体系化、系统化,成为中国外交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1996年4月,中、俄等国筹建上海机制之际,成为中国考虑向世界推出新安全观的契机。1997年3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新安全观。此后,中国政府曾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提及新安全观的理念。其中,阐述得最详细、最系统的是在2002年东盟地区论坛外长级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的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⑥具体主张如下:

1. 安全的含义具有综合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内涵由军事、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一种安全的维持与获得需要其他安全的支撑。

2. 安全的手段是多样性的。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88页。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90页。

^③ 本文关于“霸权必衰”的总结参考了樊勇明的论文:《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及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9期,第20~21页。

^④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95~96页。

^⑤ [美]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3页。

^⑥ 《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第3版。

决争端与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寻找安全的手段趋向多样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

3. 安全的内容具有平等互利性。新安全观认为安全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该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4. 合作的模式具有灵活性。灵活性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 “霸权稳定论”与新安全观之比较

尽管“霸权稳定论”与新安全观⁰提出的时间有迟早,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两者却成为指导美国、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理论。中美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在处理许多外交问题时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严重分歧。通过比较“霸权稳定论”与新安全观的异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美在对外政策中的差异,包括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

1. 关于国际社会状态的基本假定。两者均假定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无等级隶属关系,“霸权稳定论”更多地建立在现实主义人性恶的观点上,即: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不存在强有力的国际政府,自助的生存需要使国家之间无法以诚相待,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只能由一个以实力分配为基础的霸权国来实现。新安全观认同“霸权稳定论”对于国际社会的基本假定,但新安全观立论的基础是人性善、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认为国家之间可

以友好,可以建构互相合作的关系。两者的差异就为“霸权稳定论”奠定了现实主义悲观论基础,指明了新安全观的乐观前景。

2. 关于国家间的等级状况。“霸权稳定论”虽然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之间无隶属关系,但是认为世界稳定与秩序化的客观需要要求霸权国去强制建立等级体系,树立霸权国的领导权威。而新安全观认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主权国家,它们是平等的,伊拉克和美国一样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

3. 关于利益对于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两者均认为利益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是“霸权稳定论”关注的是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s),即我所得是否大于别国;而新安全观更多关注的是绝对得益(absolute gains),即我是否有所得。虽然霸权国能够容忍非霸权国的免费搭车,但并不表示霸权国不关注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实力是决定其霸权能否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关键,所以霸权国提供的公共商品其实与国内的公共物品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无私的奉献。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国际安全框架的最终受益者是霸权国,若霸权国无法从中受益,则霸权亦难以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足以证明这一道理。新安全观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国很难获得相对得益而不损害自身利益。“以邻为壑”只会作茧自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成为佐证。因此,只有相互之间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进行利益协商,才有可能推动双赢的诞生。至于谁得更多、谁得较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协调的机制存在并不间断地运作,安全就能够得到较大地保障。

4. 关于安全内涵的界定。“霸权稳定论”已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单纯权力政治的分析框架,进入了从经济、政治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的新阶段。但是其安全的概念尚不具有综合性,在一定程度上仍囿于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框架。新安全观除重视传统安全之外,还十分关注包括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新安全要素,反对强调某一类安全而忽视整体平衡。关于在什么情况下是安全?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与积极安全。^①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霸权稳定

^①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4, edition, p. 207.

论”强调后者,即:积极安全,也称之为相对安全,即我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否绝对小于其他国家所受的威胁;新安全观认为安全与否并非取决于实力差距,而在于国家所奉行的内外政策,^①即判断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时,他国的强弱、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推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加强,国家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国家之间的安全应该是“我给你安全,你亦给我安全”,安全的标准应该建立在相互安全的基础上,即互相给予对方以安全信心。

5. 关于寻求安全的方式。“霸权稳定论”认为,战争既可以带来霸权,也是破坏霸权的手段。国际安全的焦点集中于军事、武力手段。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认为,一战结束了英国的霸权,二战迎来了美国的霸权。非霸权国对霸权国的挑战,通常的手段也是战争。所以,霸权国若要稳住霸权地位,军事实力是关键。新安全观认为寻求安全的手段是多样的,因为目前威胁世界安全的要素是多样的,如经济安全威胁、文化帝国主义、恐怖主义威胁等等。对来自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威胁来说,武力固然可强迫他人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毕竟是背景性的、间接的、无法直接奏效的”。^②美国可以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要改变中东地区普通百姓对美国的看法,减少彼此之间的敌对猜测却异常艰难。

6. 关于现行国际体制。两者均认同国际体制的作用,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建立相互有益行为方式的契约或准则,可以改变相对交易的成本,减少政治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而且,机制还为有关各方提供相互和平解决有关问题的平台。但是在机制的执行问题上,两者亦存在根本的差别,霸权稳定论认同有利于霸权国且具有等级差别的国际体制。以今日美国为例,它对待国际机制的态度比较实用主义:若国际机制可以为美国带来实际利益,它便积极支持,而且还号召其他国家一起行动;若国际机制无法为美国利益服务或阻碍其发挥领导作用,它则置国际机制于不顾,或干脆退出,如退出《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在美国看来,联合国机制也要根据其利益来判断是遵守还是违反,在伊拉克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得不到联合国对伊动武授权的情况下,布什在 2003 年 3 月 7 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为了美国的安全,我们不需要联合国的授权。”但是面对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巨大任务,美国又呼吁联合

国发挥必要的作用,实质上是要其他国家为美国分担战争成本。

中国认为现有的国际机制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客观上为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应该积极利用,并在利用的过程中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改造。目前,联合国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主要的组织,若无视它的存在,那么弱小国家的主权在强权之下就会毫无保障,世界又何来稳定与和平?

三 几点评论

作为影响现代国际关系的两大理论,“霸权稳定论”与中国的新安全观各自均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通过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在价值判断、行为方式、时代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较之“霸权稳定论”,新安全观更加适合当今客观的国际形势,理应成为指导未来各国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

1. “霸权稳定论”关于霸权结构的理论基础相当薄弱。首先,霸权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结构,它与多边自由的国家秩序是不能相容的。霸权体系下的利益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因此希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以公正为基本特征的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现实的。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比,只不过是多了对经济因素的论述,其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后者的水平上。其次,霸权与稳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大不列颠霸权时期的战争与冲突并不比无霸权时期要少。我国学者秦亚青教授曾通过统计研究论证:“从 1941 年到 1988 年,国际冲突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没有明显的逆向关系。”^③所谓稳定只不过是霸权国为自己的单边主义行为寻求合法性的借口。

2. “霸权稳定论”关于国际社会基本状况的假定不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现实。虽然目前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但并不同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描述的“人人自危”的敌对状态,而“霸权稳定论”恰恰就陷

^①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载《人民日报》,1997 年 4 月 24 日。

^②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5 页。

^③ 秦亚青:《霸权体制与国际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第 114~126 页。

入了霍布斯式的“安全困境”，行为者对别国产生种种“莫须有”的敌对与恐惧。正是基于“霸权稳定论”关于国际社会状况的基本定位，布什政府才做出了许多不能与别国协商的“单边主义”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拿破仑式的“先干了再说”的行动。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基本判断是：它拥有核武器、生化武器，萨达姆政权是敌视美国的“邪恶轴心”之一，这种判断建构出敌对的美伊关系。若美国把伊拉克与联合国的已有合作看成是诚信的起点，也许，伊拉克局势就截然不同。当前由于科技的进步、文化交流的频繁、经济联系的紧密，各国之间的主流关系是互不为敌，互相尊重，互利互益。当冲突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友善地对话来解决问题，若用“霸权稳定论”来解释这类现象将非常贫乏。

3. 霸权稳定论关于国家地位的定位使得国际问题的处理失去了平等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美国许多决策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因此美国已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国的地位。在中东地区，美国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力量，通过一些军事安排，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家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加上强大的伙伴国以色列的支持，中东没有美国的干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问题均体现了美国的主导作用。但是，伊拉克萨达姆的长期敌视、“9·11”事件及阿拉伯各国的反应给美国一个印象：美国尚未在中东建立霸权领导。如何将“美国主导下的中东转化为美国霸权下的中东”^①呢？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中东发动一场让各国为之瞠目的高科技战争，对树立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威信是件好事情。所以在对伊拉克危机与战争的处理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美国以领导自居、颐指气使的身影。

中国新安全观关于国家角色地位的定位比较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目前该准则已为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守，联合国等重大国际组织的运行也体现了国家的平等性。平等是和平协商、谈判的基础，霸权稳定论下的等级制国家关系，只能使和平成为奢望。

4. 安全无论古今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安全内涵的扩展需要有新的安全利益评估思维与之对应。安全概念的基本意义是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而言的，而且安全应该是建立在物质实力基础上的心理预期，所以它

是一个浮动的概念，各个国家对其定位肯定是不同的。但是现行国际社会中存不存在霸权国所追求的绝对的安全？“9·11”恐怖事件无疑给出了答案：美国并非绝对安全。那么，一个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实行排他性的或者说“单边主义”的政策达到绝对安全？反恐的艰巨性本身向世人昭示：“美国虽然是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超级大国，却无法独自实现重要的对外目标。”^②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措施：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坚持对伊动武，不但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制造了紧张气氛，而且也加剧了世界的不安全感。

安全内涵的扩展、非传统安全的凸现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的客观存在，它要求人们对安全利益和手段进行再思考。恐怖主义、生态污染等不确定的安全危险只有通过各国政府及民间机构的合作才能带来共赢；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全球化要有恰当的消解手段才能提高效率。“9·11”事件表明，当今世界，古典安全游戏规则已被打破，恐怖主义炸弹威胁并非尖端武器所能清除。若固守老的安全原则，武力第一，则无助于国际社会真正的安全。

具体到伊拉克问题上，到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发动的战争只会给伊拉克人一个师出无名的侵略信号，这个信号只会加剧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敌对。美国在欢庆伊拉克战争胜利的同时，头上似乎总是有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为伊拉克问题和平解决做努力。中国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重申对伊问题的原则，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即通过协商和对话的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③协商与对话可使美伊双方将武力风险降到最低。若美国能够遵守联合国的和谈与核查机制，也许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可以有一个和平的解决途径。

[收稿日期：2003-03-13]

[修回日期：2003-06-08]

[责任编辑：谭秀英]

① 东方晓：《“9·11”之后美国霸权下的中东》，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4页。

② [美]约瑟夫·奈：《美国的力量与界限》，载《参考消息》，2003年2月20日。

③ 蒋道力：《争取和平、维持公道、维持团结——解析中国对伊拉克问题的政策》，载《环球时报》，2003年2月26日。

sion. All of these problems merge into the historical issue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y seem to be problems superficially created by Japanese right-wing conservative forces, but in essence their source is the Japanese ambition to be a great power.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historical issu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an improvement in the Japanese people's recognition of their war history.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 Factor in Contemporary Terrorism

Xiao Huan Jiang Xinxue(47)

The mass media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errorism.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a kind of "partnership" among them. To some degree, extensive media coverage has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of terrorism and has had som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anti-terrorism operations by govern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ss media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one kind of valuable strategic resource in a government's anti-terrorism endeavors. However, the mass media can be used by some countries as an instrument to produce the label of "terrorism" in order to fulfill their global strategy.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vs. the Chinese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Sun Xiaoling(52)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guidelines for current American and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the Chinese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have had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will help u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well as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 some important issues, for instance the Iraq issue.

State Sovereign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Germany] Ernst Benda(57)

The "de-boundary" phenomenon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puts all countries in a position whereby they would rather take act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reality of globalization than to be free to make any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absolute state sovereignty. Global issues have to be solved within a global framework, which requires a partial transfer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nature, the signing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r agreements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partial transfer of state sovereignty. The restoration or safeguarding of world peace is a global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the sole business of each sovereign state. When a conflict takes place in a state or a region, the problem will never be remedied if respect for state sovereignty is emphasized and there is no intervention. However, how to intervene in internal confli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on the case-to-case basis.

On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America: A Case Study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n Xiao(61)

The growth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is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U. S. conservative movement is a nationwide network of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hold strong convictions and firm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neo-conservatives emphasize specifically that